

國立故宮博物院新藏花押印 考略

龍樂恒

法國著名東方學家、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於1900年代陸續在華北、甘肅、新疆進行考古調查。發掘、購得文物大多捐贈給法國國家圖書館、吉美博物館，但是也有部分在其去世以後，流落在家屬、學徒手裡。一批元代（1271-1368）花押印如今歸屬於巴黎一家古董行，十多年前請筆者鑑定，並將其中九方送與筆者。筆者將這些花押印於2011、2017年陸續捐贈予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供大眾研究。本文探索花押印的可能來歷，將之一方一方發表，與同仁學者分享這些珍貴文物。

法國人伯希和（圖1）以漢學、文獻學奇才馳名中外。實際上也應該說是語言天才，他精通拉丁文、英文、德文、俄語、漢語、藏語、波斯語、阿拉伯語、蒙文、土耳其語、越南語、吐火羅語等中亞語言，對東亞文化的研究包羅萬象，實為東方學家。難能可貴的是他對於研究文化交流及佛、景、回、摩尼、拜火諸教之傳播的貢獻卓越。伯希和的著作中亦可見旁徵博引中文、阿拉伯文、蒙文、拉丁文文獻、術語、人名、地名等。

伯希和亞洲之探索、科學歷程

伯希和1897年畢業於東方語言學校（巴黎國立東方語言學院前身，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簡稱INALCO）。1899年8月15日成為印度支那考古考察會（1901年改名為「法國遠東學院」，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簡稱EFEO）的會員。1899



圖1

1905年或1909-1910年間 探險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像 納達爾（Nadar, 1820-1910）攝 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藏 ©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年年底到安南國（今越南），並多次在越南、北京、天津一帶蒐集書籍文物，直至 1904 年 8 月回法國。1906 年 6 月 15 日伯希和離開巴黎，為其在探險、考古、研究科學等各方面意義重大的遠行。他從俄羅斯入新疆，取絲綢之路北道經喀什、阿克蘇、庫車、敦煌、西安、鄭州等地，於 1908 年 10 月初抵達北京。結束旅行後，伯希和於 1909 年底回法國，1911 年任法蘭西學院特設的中亞語言、歷史、考古教授職位。此後，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時先在土耳其擔任與英國海軍聯絡的軍官。1916 年 5 月 28 日奉命出使駐北京法國大使館的副武官。1918 年俄羅斯十月革命後，在西伯利亞海參威（Владивосток）、伊爾庫茨克地區（Ирку́тск）協助白俄羅斯殘存部隊抵抗紅軍。1919 年 2 月又在北京逗留一段時間才回到法國。這三次長期在越南、新疆、中國、俄國的外出旅行，可謂伯希和收集資料最豐富的時期。伯希和亦在 1921 年 5 月 6 日當選為法蘭西金石、文學院院士。

伯希和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遠行亞洲四次，1932 年 10 月 21 日在法國馬賽乘輪船到亞洲檳城、曼谷、吳哥等地，並在中國南京、北京、天津、日本各地巡迴演講及收集書籍，於 1933 年 5 月底回法國。¹1935 年 8 月之前伯希和為籌備 1935 年 11 月 28 日至 1936 年 3 月 7 日於倫敦舉行的「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又巡行中國、日本，興許這兩次收集文物的機會甚少。在 1945 年 10 月 26 日歐洲干戈剛平息時，伯希和在巴黎與世長辭。

伯希和雖然對語言、文字學研究頗深，專門研究元代璽印、文字著作卻甚少，僅有

兩篇涉及到「八思巴文」與「景教印」。

1927 年 3 月 11 日，伯希和曾在法國亞洲研究會（Société asiatique）作〈關於八思巴文字淵源（L'origine de l'alphabet ph'ags-pa）〉的演講，迄今未發表成文章。1931 年發表〈發現於河西的白鴿、十字形銅質印符簡考（Sceaux-amulettes de bronze avec croix et colombes provenant de la boucle du fleuve Jaune）〉，²總結當時對景教印符的西洋漢學文獻初步研究，並發表九十方十字形，以及相對、向背或單隻的鳥形印身照片。

伯希和研究範圍還包括居庸關雲台石刻和契丹文，然而他或許認為花押印、姓氏加八思巴文的「記」印，與語言學、文化、宗教交流、文史研究意義不大，因此也就沒有進一步探討研究。或許將來有一天，會在伯希和遺存尚未發表的文獻中發掘相關資料。

伯希和藏印來歷

伯希和至今已經發表關於他在中國的記載中，尚未明確提到他如何獲得三百一十五方元押銅印。³

伯希和在 1906 至 1908 年三年之久的絲綢之路行程中，於 1907 年 1 月到 9 月在庫車一帶探索古蹟，收集十五多方印章。透過閱覽伯希和的遊記、考古報告描寫和圖版，⁴可斷定大多為西域文化風格濃郁的肖形印（如獅子圖形印），年代約為北朝（420-589）、隋唐（581-907），最晚至五代（907-960），與本文所研究的花押印無關。1908 年 3 月伯希和考察敦煌千佛洞藏經石窟後經過涼州，於 8 月 23 日抵達西安城，於此地待了一個月，

在此收集「十二來方漢印、元印六十餘方，其中六七方刻有八思巴字」。⁵「六十餘方印」雖然不足三百多，但伯希和在西安得到的可能是在河西一帶發掘或購買的傳世元代花押印、八思巴文印。

伯希和於 1916-1919 年間在華的事跡不明；除了 1918 年曾待在兵荒馬亂的西伯利亞，然而此地並非考古調查之處，他前後待在北京的時間是否有空逛古玩行收集印章？之後他在 1932、1935 年作演講、籌備展覽，與中央研究院、中國學者合作。除非同事朋友贈送，否則已經不好順手牽羊了。所以這三百一十七方花押印，大概是伯希和於西域、甘肅、華北之行時所獲。然而至今伯希和生前尚未發表的學術論文、書函頗多，軍事、外交檔案也不少。有望透過「伯學」專家多方努力才能「一旦雲開復見天」。

伯希和去世後，藏印由年輕二十歲的俄國妻子 Marianne Skoupenska-Kavorskij（或作 Marianne S. Kavorskij 或 Karkovskij）所繼承。

伯希和夫人離世後，阿蘭·畢黎游（Alain Brieux, 1922-1985）成為財產繼承人，承繼全部三百一十七枚印章。畢黎游是巴黎有名的科技史古書商、藏書家，書店至今仍在巴黎第六區 48, rue Jacob 營業。2000 年代初，畢黎游夫人將整套印章全部售予雅克·巴雷（Jacques Barrère）古董行。巴雷氏請筆者鑑定伯希和花押印，送其中九方以自娛，筆者又於 2011、2017 年陸續捐贈給國立故宮博物院。

伯希和藏印年代、歷史意義

筆者捐贈給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伯希和舊藏九方銅印，為元代民間流行的璽印。（圖 2～10）

九方花押印大多呈長方形，其中一方呈葫蘆形。（見圖 4）另外六方上半鑄行、楷書姓氏，下鑄花押，可謂狹義的花押印。另有一方上治姓氏，下有八思巴文「𑖀𑖄𑖆」（漢字「記」的拼音）。（見圖 2）此外還有一方同



圖2 元 銅印 長2.25，寬1.3，高1.5公分，重8克 鈐印：「柴·記」花押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柴」字為漢文楷體，「𑖀𑖄𑖆」為八思巴文的「記」字。



圖3 | 元 銅印 長2.7，寬1.4，高1.55公分，重13克 鈐印：「關·押」花押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 元 銅印 長2.5，寬1.6，高1.75公分，重8克 鈐印：「郭·押」花押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 | 元 銅印 長2.6，寬1.25，高1.75公分，重9克 鈐印：「鞠·押」花押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時兼用漢字、八思巴字和花押。（見圖 10）

1990 年代始有印學家（如孫慰祖）研究唐宋元私印，出版花押印印譜研究，編出詳細可靠的參考資料，便於斷代。伯希和舊藏的漢字花押印或許可作為是宋代（960-1279）遺物，然而某些特徵卻證明其實是元代文物。⁶ 例如宋代刻花押的印章大多無邊欄，印大致作方形。北宋在花押上面刻主人姓名長方形者，鑄刻較深，印臺較厚，印鈕成平頂橢形，有

的消去邊棱，有的印鈕上端弧形，截面或方形或長方形，均有穿孔。南宋印刻得比較淺，元代印則刻得更淺。

孫氏對這種花押印的解釋為：「……普遍所見的是輕巧的印形。無論漢字還是八思巴字長形印記，不僅印台甚薄，印鈕亦僅容捉捏，變得單薄、低矮，絕大多數均有孔可供，是一種適應使用，材料成本較低，易於普及的形態。」⁷



圖6 | 元 銅印 長2.6，寬1.1，高2.0公分，重9克 鈐印：「李·押」花押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 | 元 銅印 長2.9，寬1.75，高1.65公分，重15克 鈐印：「蘇·押」花押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如此節省青銅的印章，適合提供給一般平民百姓作為便宜的取信工具。當時有印匠大批使用同一印範生產花押印，伯希和收藏亦有幾批可達六方之多的印章，明顯用一個模子鑄出來，僅磨損、侵蝕狀況不一而已。如同現代日本印匠製造大批現成的大姓小圓形木印，作為應急用印。

整體而言，鑑別印章真偽的要訣為觀察其是否銅鏽薄，銅綠偏黑，銅質密，氣泡少。

由此看來，伯希和收藏的八思巴字印章定年不早於 1269 年，也不晚於 1360 年左右。西藏著名密宗法師八思巴（又作巴思八、拔思巴，1235-1280）被忽必烈召入朝，後賜國師官銜，命他以西藏字⁸為基礎，作適於寫蒙古文的新文字；名曰「國字」，或曰「蒙古新字」，蒙文又曰「方字」，通稱「八思巴字」。這種同時靠字母和音節而成的文字原用於蒙文，但也用來書寫藏文、中文，甚至畏兀兒



圖8 | 元 銅印 長2.7，寬1.45，高2.4公分，重12克 鈐印：「蕭·押」花押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 | 元 銅印 長2.7，寬1.35，高1.45公分，重9克 鈐印：「張·押」花押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0 元 銅印 長2.8，寬1.25，高1.9公分，通重18克 鈐印：「益用平安」花押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漢——八思巴文花押合戰印

文、波斯文等，可謂最早漢語通行的拼音文字。1271年官方規定凡官印者必用八思巴文重刻。元代亦有不少中文聖旨、書籍均使用八思巴文。然而八思巴文流行於民間大概不早於1280年代；而最早在1350年代紅巾起義時即被漢人用棄；只有北元仍舊使用，直至1402年亡國。雖然八思巴文字特別方正，但是刻官私印又將之「篆化」來倣宋代九疊篆字體，例如將「記」（記）寫成「𑖇𑖉」，是為蒙古篆字。

古代花押印作偽冒假的可能性不大。民間楷書、蠻夷字印，不值文人所賞識；偶爾在印譜末卷叢集幾方，當成異域奇文，正如肖形印者也。惟1990年代以來，終於展開唐

宋元璽印的科學研究——包括孫慰祖的論文、專著——才湧現收藏愛好者和贗造者。然而，伯希和目光精闢，這批印章至少在七十五年前運入法國，能肯定印章的真實無誤。

廣義的花押印（包括楷書、行書印記、肖形印、景教印等）多為古印人所不重，認為是民間、蠻夷遺物。偶爾列入印譜末頁，僅視為古怪玩意而已矣，壯夫所不為；弄鐵筆者刻之如鳳毛麟角。

然而，這些花押印的歷史價值和意義卻不可忽視，為世界著名東方學家伯希和舊藏。他與同事沙畹（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 1865-1918）、馬伯樂（Henri Maspéro, 1883-1945）和葛蘭言（Marcel Granet, 1884-1940）

等人在二十世紀初奠立法國漢學傳統。再說這些花押印保存狀況甚佳：印面可謂清晰，印身無嚴重損害。伯希和原藏的三百十五方花押印數目之多，為中國博物館、收藏家、印譜著錄所無，似乎最多不超過一百方左右而已。

結語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元押印數量不多。筆者近年陸續捐贈九方花押印，豐富清宮舊

藏；且品相、來歷不凡，為深具歷史意義的佳印。

本文謬誤難免，懇請讀者多指教。戊戌季秋龍樂恒識於涼思齋。

作者為巴黎國立東方語言學院漢學博士、西泠印社社員

註釋

1. 伯希和，《1933年向太平洋委員會出差中國報告》，頁28。原文見 Paul Pelliot, *Rapport sur sa mission en Chine en 1933, Commission du Pacifique*. 巴黎：吉美博物館圖書館藏，1933年6月26日打字本，書號：42781/Car/B/24。
2. 伯希和，〈發現於河西的白鴿、十字形銅質印符簡考〉，《亞洲藝術雜誌——吉美博物館年鑑》，圖版8。原文見 Paul Pelliot, "Sceaux-amulettes de bronze avec croix et colombes provenant de la boucle du fleuve Jaune," *Revue des arts asiatiques, annales du musée Guimet* 7 (1931-1932): 1-3. 中譯版見龍樂恒，〈發現與河西的白鴿、十字形銅質印符簡考〉，《西泠藝叢》，2018年4期，頁57-60。
3. 伯希和在1899年至1909年的活動及相關資料如下：1899年8月15日至1900年4月15日以及1901年2月22日至6月26日，見〈1899-1901年間北京札記〉，《法蘭西學院藏未刊行文獻叢書》，原文見 Paul Pelliot, "Carnets de Pékin, 1899-1901." in *Documents inédits du Collège de France*,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76. 至於伯希和1901年6月以後的活動及關於法國遠東學院的記載，見1901年創刊至今的《法國遠東學院年刊》(*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中的〈本院消息 (Chronique)〉專欄，由法國遠東學院出版。伯希和1906至1909年間在新疆、甘肅的考古調查，見《1906至1908年行程札記》、〈發現於甘肅省之中世紀圖書館〉與〈1909年12月10日伯希和先生在索邦大學大禮堂敘述其在中亞高地三年考古的演講〉。原文依序見 Paul Pelliot, *Carnets de route 1906-1908* (Paris: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les Indes savantes, Musée Guimet, 2008). (由法國國立博物館聯合會、天竺多聞出版社、吉美博物館聯合出版)；Paul Pelliot, "Une bibliothèque médiévale retrouvée au Kan-sou,"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8, no. 3-4 (1908): 501-529.; Paul Pelliot, "Trois ans dans la haute Asie, conférence de M. Paul Pelliot au grand amphithéâtre de la Sorbonne, le 10 décembre 1909," in *Bulletin du Comité de l'Asie française*, edited by Comité de l'Asie française (Paris: Comité de l'Asie française, 1910.1), 4-16. 關於伯希和對三百多方花押印的研究，見龍樂恒編，〈伯希和舊藏花押印集〉，《篆物銘形圖形印與非漢字系統印章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杭州：西泠印社，2016年10月），頁757-790。
4. 伯希和，《1906至1908年行程札記》，頁88、121-128；Paul-David Madeleine, 《法蘭西金石、文學所發表伯希和勘探隊考古文獻》，冊3，圖43；冊4，頁389-390；冊8，頁55-56，圖33-35，原文見 Paul Pelliot, *Mission Paul Pelliot: documents archéologiques publiés sous les auspi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由韓百詩 (Louis Hambis) 等編著。此套書共有三冊記載與伯希和勘探隊相關的資料，分別由巴黎不同出版社出版。第三冊由法國國家印書館 (Imprimerie nationale) 於1967年出版；第四冊由文化研究出版社 (Editions recherches sur les civilisations)、中亞研究中心 (Centre de recherche sur l'Asie centrale et la Haute Asie) 和法蘭西學院亞洲研究諸所 (Collège de France, Instituts d'Asie) 於1982年出版；第八冊由中亞研究中心和法蘭西學院亞洲研究諸所於1987年出版。
5. 見〈致伯希和老師、印度學家、巨商賽拿而 (Emile Sénart, 1847-1928)〉1908年9月15日的書信，收錄於《1906至1908年行程札記》，頁428。
6. 孫慰祖編，《唐宋元私印押記集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頁11-36。彩圖3、7、13、14。
7. 孫慰祖編，《唐宋元私印押記集存》，頁19。
8. 西藏文字本身淵源於天城文，由國王松贊干布 (569-649) 所宣布。